

网络文学评论

阿耐《欢乐颂》：  
资本浪潮中的女人们

薛静

在这部讲述中国城市市场经济浪潮的《欢乐颂》中,那些挣扎于传统社会秩序、现代资本逻辑中的年轻姑娘,恰恰成为50年前《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精神传人,她们选择着自己的道路,也选择着中国的道路。

住在欢乐颂2202的三位姑娘,正是转轨中的一代。她们所要争取的,表面上看是能够立足上海、过上衣食无忧的都市生活,实际上却是离开传统话语和秩序,依靠经济转型获得女性话语。

不得不,《欢乐颂》这个书名,起得极不走心。先让人联想到的当然是贝多芬的名曲,再结合“现代都市”的标签猜测一下,又不免让人感到主旋律之气扑面而来,直到翻开封面,才知道这不过是主人公所在小区的名字。

然而与书名的不走心相反,书中家住欢乐颂小区22楼的五位姑娘,却个个生动鲜活,连每个人的名字都别有一番意味。何安迪在福利院长大,被美国家庭收养并凭借聪明才智成为金融精英,旁人往往知道她似中探样的“安迪”,却不知道她姓何。我根何在?探寻自己的身世,也正是安迪归国的目的。富二代曲筱绡,看了这名字,出生之际爸妈抱着《新华字典》找汉字的样子就已然跃然纸上,有经验没文化的富二代,最终选定了两个看起来很有文化实际上却没意义的字,给掌上明珠命名。樊胜美,单看“胜美”两字,就已经是樊姐的小画像,这个名相当一般,搭配一般的姓氏更加俗不可耐,只靠一个“樊”撑起了文气,只可惜对人物而言,樊家却恰恰是胜美的拖累。关雎尔的名字最美,一看就是城市中产家庭出来的“窈窕淑女”。邱莹莹单纯明朗如晨露,她和应勤一样,都是城市中那善良、笨拙而勤奋的小蚯蚓。都说人如其名,能将主要人物的名字与背景、性格暗相对应,又做到如此浑然天成、不露痕迹,作者着实费了一番心思。

书名的粗与人名的细,正是《欢乐颂》“大粗小细”整体风格的一种反映。《欢乐颂》虽然于晋江文学城首发连载,但是作者阿耐却并非典型的网络文学作家。言传江浙民营企业高管才是她的正职,网络写作不过是个副业,因而早年间她也写过几部纯粹为了过瘾的穿越和武侠,转身去书写改革开放30年经济历程的《大江东去》,就得了国家的“五个一工程”奖,每部作品上百万字,从不设置付费阅读,收入不以为意,写作仅为娱情。这样的潇洒和任性,恐怕没有几个网文作家能够做到。

因而《欢乐颂》这部被作者标记为“轻松”风格的作品,也就充满了任性之气。女主角安迪天

赋异禀、身家显赫、貌美动人,不但追求者个个都是青年才俊,而且还有个老谭这样神通广大又死心塌地的男闺蜜,简直是主角光环耀眼得不能再耀眼。富二代曲筱绡也是外挂全开,一个海外归来的不学无术小太妹,竟然能接连啃下大单,危难时刻还能让日理万机的安迪挂着蓝牙耳机遥控指挥。什么逻辑都先放在一边,作者自我投射为何安迪,无限宠溺着曲筱绡,让这两个人物骄傲地成为超越凡人的存在。

如果故事只是这两个“人生赢家”的二人转,那么《欢乐颂》不过是又一部玛丽苏小说。但是《欢乐颂》的有趣有味之处,恰恰在于2202的3个“凡人”。如同50多年前那部讲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创业史》,“高大全”的主角梁生宝,远远不如充满矛盾、动摇、最终做出选择和改变的梁三老汉来得血肉丰满。半个世纪后,这部讲述中国城市市场经济浪潮的《欢乐颂》中,那些挣扎于传统社会秩序、现代资本逻辑中的年轻姑娘,恰恰成为梁三老汉的精神传人,她们选择着自己的道路,也选择着中国的道路。

三个平凡姑娘中,樊胜美最为光鲜亮丽,也最为灰败沧桑。甫一开篇,她便坚定地“扎根海市,深入繁华”的理想,“洗澡化妆做头发换了一件又一件的衣服,终于选定一件烟灰色双宫丝连衣裙”,脚踏高跟鞋,摇曳生姿地去相亲,结果却意兴阑珊地回来,随即就向邱莹莹吐槽相亲男“还敢厚着脸皮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按揭买房”。但关上房门,听见邱莹莹和关雎尔讨论论要不要相亲,又不免黯然神伤,“她的一大把年纪了,除了一大堆的衣服,一无所有”。

30岁的轻熟女,艳丽娇媚的容貌和洞察人心的情商,都是她的资本,她怀揣着这份资本,想要在上海这座繁华都市以小博大、站稳脚跟,但是现实的残酷一次又一次将她拍醒,告诉她婚姻的本质不过是市场上的等价交换,而她那点姿色和风情,远远不如贤惠、听话、工资高、家庭好来得实惠。而樊胜美的骄傲又不允许她低头,于是越挫越勇,她离开“市场”,直奔“赌场”,势要一头扎

进有钱人的圈子:“那酒吧开幕就不一样了,那些有份受邀的主儿,都是方方面面的人尖子。我呢,今天要去抬几个那样的尖儿,所以今天我是打破头皮也要去的。”(阿耐《欢乐颂》第一部第一章)

虚荣、拜金,似乎已经成为樊胜美毋庸置疑的标签,而“没事儿,有樊姐”的义气担当,与想要依靠男人衣食无忧的投机取巧,又构成了她令人爱恨交加的一面。直到《欢乐颂》第一部篇幅过半,樊胜美如无底洞一般的家庭浮出水面,她光鲜亮丽的外表才被捅破,露出灰败暗淡的内里:游手好闲、打架闹事的哥哥,重男轻女、一味索取的父母,让樊胜美承担着远超过她能力的重担。除了用她自己有限的资本套牢一个男人,似乎别无选择。于是,前半部读者积攒的对樊胜美的所有厌恶,都瞬间化为同情,她的世故与功利,也都沾染上了一丝悲凉。

然而随着剧情继续展开,安迪、奇点、曲筱绡、王柏川一齐出手相救,想要把樊胜美拉出家庭的泥潭,但是樊胜美却在大家的帮助中屡屡心软,哥嫂将瘫痪的老父丢到王柏川父母家,王出面处理,她还不免觉得他照顾不周太心狠。于是,可怜之人的可恨之处也就显现出来。樊胜美承担着这份重担,有其家庭的压榨,更源于她自己无止境的懦弱与让步。对大都市繁华、自由、独立的渴慕,和被小乡镇闭塞、愚孝、重男轻女所拉扯的现实,构成了樊胜美身上最丰富的层次。

从小城镇进入大都市,樊胜美、邱莹莹以及泛化到关雎尔,她们所面临的人生转型,正是整个中国社会从目前的“土”字形逐渐转为纺锤形的一个缩影。她们这些受过教育、白领行业的青

年女性,作为中产或准中产阶层,也将是推动中国城市不断向前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样,她们的欲望与焦虑,也是整个社会当下正在普遍面临的问题。

和几十年前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同,计划经济模式是充满释放的男性气质的,特别是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中国,我们为必需品而奋斗,崇尚力量、积极劳动,追求宗教式的清苦与受难,革命的激情与青春期的荷尔蒙交相辉映。而市场经济之后引入的新的逻辑,则是精致优雅的女性气质,必需品被冗余品所替代,满足欲望被创造欲望所替代,我们需要不断消费、消耗,才能让经济流动起来,于是懒人经济、假日经济诞生,作为“买买买”主力女性,以这种方式浮出历史地表,成为“资本”主义的“上帝”。

而2202的三位姑娘,正是转轨中的一代。她们所要争取的,表面上看是能够立足上海、过上衣食无忧的都市生活,实际上却是离开传统话语和秩序,依靠经济转型获得女性话语。关雎尔被迫相亲、邱莹莹要面对有处女情结的男友、樊胜美要摆脱重男轻女的家庭,她们为何要留在上海?因为在这一代青年女性身上,城市许诺给她们的礼物,除了阶层的提升,还有性别的解放。

“一定要留在上海!”三位姑娘以一种几乎押注赌命的方式,代表千百万从乡镇跳入城市的青年,推动着中国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她们将青春投入到繁华都市的资本浪潮之中,誓要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

链接

作者简介:

阿耐,女,1990年弃政从商,现为浙江某民营企业高管。2004年左右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于晋江文学城上进行创作,行事低调,从不透露真实姓名、照片,也不以作家身份参与公开活动。作品《大江东去》是中国首部荣获中宣部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的网络小说,此外还有代表作《食荤者》《余生》《不得往生》《回家》等。

网友评论:

《欢乐颂》的一开篇,已经是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那个“阶层形成”的时代悄悄地落幕了,凭借着天赋、出身、能力、机遇,刚出场的人物们已经被定位在一个个阶层里,于是,《欢乐颂》不再是奋斗史,而是此时此刻的一个社会切片……作者想让我们看的是各个阶层的状态与可能性。  
——苏七七《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悲欢》

历来以女性为中心的小说,爱情都毫无悬念地成为第一主题,在那些作品中,女性往往通过爱人和被爱,完成生命的价值体现。而残酷的现实说明,爱情并不能让女性实现真正的救赎和自我救赎,现代女性对内心和外界的情感诉求同样重要。《欢乐颂》中的5个典型人物,虽然没有一个能够离开感情,但爱情已非她们的生活全部……女性命运、情感、行为方式、思维习惯在21世纪中国大发展的气候中的成长轨迹,才是读者应该给予更多关注的主题。  
——才云鹏《一直在转型路上的阿耐》

《欢乐颂》看到最后,我反而最喜欢樊胜美这个角色了。正如小说里安迪描述樊胜美那样:她能揣着一颗苦得像黄连一样的心,照样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她最坚强。  
——李牧《生活真的只有活在其中 才能深有体会》

评论

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

——评董尧《北洋风云人物》传记系列 李云雷

式已经很熟悉了,从三湾改编开始,“支部建在连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兵平等、官民平等”等新的建军思想,我们都耳熟能详,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我们很熟悉,往往没有将之放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中来看,对其重要性理解得不够深刻,董尧先生这一套书可以让我们看到在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新的军队组织形式产生以前,旧的政治、旧的思想、旧的军队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孙传芳军队的政治目标就是抢地盘,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和政治信仰,孙传芳与其他军阀联合的方式就是结拜为兄弟,还是用传统的价值观念、旧的伦理关系形成一种政治关系,这相对于国民党、共产党军队,是一种陈旧落后的方式,国共两党的军队是通过理想、信念、信仰的教育,通过民族意识、阶级意识的启发,宣传组织起来的新军队。在董尧先生的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旧军队是一个什么状态。孙传芳与他幕僚之间是把兄弟的关系,他与冯玉祥、张宗昌、张学良等军阀,在政治需要的时候也结拜为兄弟,但形势一变,又变成互相残杀,他们的联盟并不牢固。孙传芳也没有整体的政治目标和政治战略,所以他的胜利是偶然的,他的失败也是偶然的,书中着重写了他的几次胜利和失败,在面对胜利或者失败之后,下一步该怎么走,孙传芳往往都没有一个特别明确和清晰的目标,所以这就最终导致他的失败。最后孙传芳一个人把军队放在河北,他自己跟张学良出了山海关,很快他的军队就被北伐军收编了,他成了孤家寡人,成了没有军队支撑的“军阀”,只能从大连跑到天津,最后不得不去信佛。书中通过他这样一个人物的经历,

写出了北洋军阀时期的动荡和混乱。就孙传芳个人来说,他也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家庭,一度成为“五省联军总司令”这样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因为他没有符合新的政治思想潮流,只有旧的思想、旧的观念,以及旧的军队组织形式,所以虽然一时拥军自重,风光无限,但也最终导致了失败。这让我们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民国,重新认识红军的历史发展过程有很大的作用。在很多人都在谈“民国范儿”的时候,这套书对我们认识一个真实的民国,也是很重要的。

我之所以选择首先阅读孙传芳的传记,是因为鲁迅先生1927年在黄埔军官学校的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中国现代社会的情况,只是实际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阅读了孙传芳的传记之后,我对这句话理解更深刻了,鲁迅先生强调“实际的革命战争”,是相对于左翼文艺,强调实际革命的重要性。而早在1923年,毛泽东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中就指出,“我们从内外政治经济的情势上,可以断定中国目前及最近之将来,必然是反动军阀支配的天下。这个时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一天进步一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新的军队是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在今天,我们只有认识到北洋军阀旧在什么地方,才能认识到红军新在什么地方,只有认识到历史的复杂性,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及其最终胜利的来之不易。

新作快评 苏童中篇小说《万用表》,《钟山》2016年第1期

一种无能的力量

顾星环

《万用表》中,苏童再次将笔锋对准少年和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一个在传统道德里浸淫、长大的乡村少年小康出现在一间城市工厂的宿舍,在果冻和花插盖之间自以为正常的孩童化、女性化心理“忍”着人欲,唯一的发泄是那句用方言喊出的无意义咒骂:“驴日的二球货!”不久,他在以大鬼为代表的城市文明的“启蒙”或曰“诱惑”之下释放出蓬勃的荷尔蒙,又终究为强大而顽固的山乡道德和旧习所吞噬。

《万用表》一如既往地弥漫着苏童擅长的宿命感。所有鲜活、闪光的物事和性情都只是昙花一现,结局总归于黯淡、冰冷和绝望。小说中,尽管抒情风格和诗性表达在减少,但都节制、简洁、一气呵成。小康的第一次命运剧变只有半个月,小康本人甚至没有在这次剧变里出场,作者只借大鬼之眼描写了一番宿舍的新变,这剧变就足以令老江湖大鬼感到惊讶:“大鬼有点惊讶,半个月的工夫,小康成功地把这间宿舍变成了他一个人的世界。”小康本就是一个没有“忍”到底的人,他被大鬼扣了一脸面条汤时,“忽然跳起来,像一头疯牛朝大鬼俯冲而来。小康的脸像一块石头,尖锐而沉重地撞在大鬼的手臂上。而且,小康咬了大鬼一口。”在被大鬼掐住脖子后,起先还是“我,忍”,但终于忍无可忍,“怒吼着冲出了大鬼五指的封锁”,后来大鬼问他要不要去看电影,他的第一反应是“想了想,似乎有兴趣”。大鬼对他提及小姐时,他的第一反应又是“眼睛一亮,闪避着大鬼的目光”。小说中,小康始终将代表着新鲜文明的大鬼视为精神之父。因此,一旦大鬼离开,他便自己通过模仿扮演起这个父亲:做电工、喜欢梦露、挂金项链、染发、刺青、学走路的姿态、自由恋爱。这里只有作为细节的伏笔,没有奇崛、做作的情节。

小康的第二次命运剧变则以小康归来的希望不断消失为理路:先是一个礼拜之后,小康离开宿舍,跟瓷厂请了5天假,此时尚有他的人影;但“五天以后,他打了长途电话给厂里,说家里出了点事,还要过五天才回厂”,此时只闻人声;直到“过了好久”,他的表兄来宿舍收拾东西,人们才终于获悉小康“一去不返”的谜底:“他老婆跳了崖,没死成,落了个全身瘫痪”。不断延宕的叙述时间被作者徐徐写来,甚至有舒缓自如的色调。最终,一只搪瓷扁扁桶在电话那头落地时造成的“清脆的震颤”,使这场时快时慢或短或长的命运之变徒留一缕耐人寻味又令人掩鼻而泣的余韵。如此,“宿命”显现出命运自身的无常、弄人和不可辩驳。

《万用表》中充满对照式的写法。首先是两个主要人物:以“康”命名的小康其实并不健康,他在小说前半篇的蒙昧状态代表着今天依然盘踞于山区的旧道德,后来的转变被简单粗暴地定性为“坏”——“表兄说,反正家里人都怪小康,是小康不好,他在瓷厂学坏了。”大鬼则难赋褒贬,“鬼”本也与是非善恶无关,但它至少代表着古怪、诡秘、歪门邪道、隐隐的不安和威胁。万用表作为符号,一方面作为科技的象征,被以“万用”命名,在不同人手中体现着万用的功能;但在精神层面,作为一个实在之物,又是“无用”的。苏童在这些对照中传达着他近几年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思考:现代科技、城市文明是否真的能让人拥有更多的智慧和更大的幸福?转型和改革是否真的已经使人类告别悲剧、获得救赎?倘若所谓的新与旧、城与乡都难以成为人类命运最终的安息地,那么我们的路途又在哪儿?